

走进释古时代丛书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成果

山东银丰集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基金赞助项目

王仲孚 著

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王仲孚 著

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

走进释古时代丛书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成果

山东银丰集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基金赞助项目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王仲孚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 - 7 - 209 - 10018 - 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上古史—研究 IV. ①K21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572 号

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

王仲孚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25. 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2000

ISBN 978 - 7 - 209 - 10018 - 2

定 价 58.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新版谢序

《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是旅居台湾的山东籍著名学者王仲孚先生的大著，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征得王仲孚先生的同意，改以简体字的形式在大陆再版，和广大读者见面，在此由衷地表示祝贺！

王仲孚先生是山东龙口市人，从小在胶东抗日战争环境中长大，对家乡有厚重的感情，对艰苦的抗日战争有极深的印象。一九四八年随父母迁居台湾，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其后，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从事中国上古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历史学教授以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务。潜心治学，造诣极深。他开设的“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讲座，以其令人服膺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爬梳大量的上古史文献资料，结合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上古史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这部著作就是王仲孚先生的上古史研究的代表作。书中探讨了哪些问题，挖掘了哪些资料，运用了哪些理论与方法，读者翻阅一下就可以知道。我着重谈一谈我拜读之后的几点体会。

一、对疑古思潮的批评有理有力

王仲孚先生在《自序》中讲到，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台湾历史学界受到疑古之风的影响，“对于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可信程度，许多人还坚持着保留或否定的态度”。王仲孚先生不顺风，不跟风，对

疑古之风抱理性审视的科学态度：他一方面对疑古之风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主客观原因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疑古之风从20世纪二十年代兴起以来对中国上古史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上古时代的历史文献，文本形式不一，有的是一部书，有的是一篇文章，更多的是一些零散的片断。由于绝大多数来自于口碑传说，是流传了几千年的先民们的历史记忆，又是在距今两三千年的以前记录下来、写成文本的，这就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记述者是谁、材料来自何处、流传过程有无加工以及有多少加工等等，往往不清楚。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看待这些问题，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疑古派的学者与我们不同，他们是“疑”字挂帅，大胆怀疑，小心辨伪，在上古史研究中存在着疑古过勇、矫枉过正的现象。王仲孚先生揭示疑古成风的弊端，和李学勤先生倡导的“走出疑古时代”遥相呼应，说明海峡两岸上古史研究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疑古思潮带来的消极影响。近几年，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审视百年来的上古史研究，思考“走出疑古”之后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这是中国上古史研究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我们提出的主张是：去者，疑古；从者，释古。为此，我们正在组织编纂“走进释古时代丛书”，努力尽快拿出一批科学释古的研究成果。

二、对中国上古史著名人物的评价客观公正

海峡两岸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过几十年的长期隔离，两岸历史学界也因此而中断交流，互不往来。大陆几十年间新发现的地下考古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王仲孚先生曾经感叹地说过：“两岸之间更是处于紧张的状态，许多大陆上的考古新材料，在大学校园里既得不到应有的信息，即使得到一些，为免触犯禁忌，也不敢随意地运用。所以在两岸开放交流以前，在大学任教而从事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倍感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仲孚先生和他的志同道合

的师长、朋友、学生们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在上古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若干上古史人物和事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评价，和同时期的大陆研究成果相比并不逊色。对上古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还要允许百家争鸣，发表不同意见。纣王是商代末年的暴君，王仲孚先生根据他多年的研究，从商代末年革新和守旧两派斗争的延续上，为纣王说了一点公道话，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纣王的总体认识，但却避免了好与坏的绝对化，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认识。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有了共同祖先，我们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共同的血缘传承，有了延续数千年而不绝的共同的文化命脉。祖先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是全球华人心心相印、相通的基础，也是两岸凝聚共识的基础。王仲孚先生研究了不少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为两岸的祖先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责任。

三、历史分期与古史系统的重建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持续发展四五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中华民族何时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哪些历史发展阶段？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史学界就有研究和争论，到了五六十年代，大陆史学界又围绕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的讨论和研究。作为学术问题，允许自由讨论，提倡百家争鸣，有意见分歧是正常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有些意见慢慢趋向统一。比如，关于古史分期，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与此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一个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问题，史学界讨论热烈，意见纷呈，但是，待到编纂历史教科书，需要拿出一个定论的时候，各种不同意见还是统一到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坚持的观点上，以致慢慢形成了大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王仲孚

先生认识到了历史分期的重要性，他坚持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不避政治忌讳，向台湾史学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依据马克思（思）主张历史演化的阶段论：依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套进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远古至清代的阶段划分如下：原始社会（远古—禹）、奴隶社会（夏代—春秋时代）、封建社会（秦汉—清代）。”接着又进一步介绍了大陆史学界普遍采用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历史分期观点，如：

原始社会，分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两个时期；

奴隶社会，从夏、商、周到春秋时期；

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之交（具体年代，郭沫若定为公元前475年）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

与历史分期几乎同等重要的，是古史系统重建的问题。重建古史系统首先遇到的是年代问题。王仲孚先生引用了董作宾先生的一段话指出：“民国以来出版的教科书，无论是大学用的、高中或初中的教科书，谨慎的编者，多含糊其辞，不写出年代；老实一点的编者，只有照着旧传统的年代抄之大吉。不著年代便易使人惶惑，得不到真切的印象，而凡是写出年代的，又没有一个是错误的数字，这当然不能怪编者，只怪没有一个准确可信的数字可供他们参考。”怀疑古史年代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对古史系统造成破坏的直接原因。王仲孚先生在审查和批判了疑古派的一些错误言论后，很痛心也很诚恳地说：“我国传统的古史系统，是古代无数学者，经过漫长的考察时间，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我们对于传统的古史系统，应作如是观才是。”因此，他希望研究古史的学者不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不是着眼于破坏而是着眼于建设，以扎实的研究重建一个有年代指标的古史系统。

四、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

自从王国维采用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取得了卓越成就以后，

地下考古资料就成了古史研究的“半壁江山”。王仲孚先生的古史研究就是如此，他的绝大多数的古史研究都坚持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寻找证据，经得起“拿证据来”“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的检验。他认识到“‘考古学’是一门近代新兴的学科，它可以从地下掘出古代的遗物，作为载籍以外的证据，‘科学精神’尤其是民国以后的国人所不敢抗拒的新思潮，所以，‘考古学’曾被认为是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方法”。他指出：一九二〇年被人们寄予厚望的考古学在中国有了显著进展，是年，法国神父桑志华首先在河套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有力证明了中国有石器时代的存在；次年，瑞典人安特生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又证明了中国有新石器文化的存在。的确，考古学揭开了中国上古史新的一页。但是，有个别西方学者根据一鳞半爪的考古资料，牵强附会，断言中国民族与文化非本土所生，而是来自西方。一部分国人受其蒙蔽，竟信以为真。在这大是大非面前，王仲孚先生没有丝毫的迟疑，他设专题研究中国民族“西来说”的形成与消寂，对德国的基尔什尔、英国的威尔金生、法国的拉克伯里等一批西方学者所散布的“西来说”进行了系统地驳斥和批判。他指出：中国境内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使得学者们重新审视并解决中国民族“西来说”问题有了更多的新材料、新证据，事实证明“西来说”完全是无根的滥言。再向上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已发现的文化遗址覆盖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一九二九年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世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华北一带就有人类活动。“虽然‘北京人’与现代华北人尚没有任何直接渊源的证据，但国人对中国人种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本土的信心却更为坚强，拉克伯里之说也就更不受人重视。”

重视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学与历史学有机结合起来，审视并解决上古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是王仲孚先生治史的显著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学风。

二〇一一年八月，我邀请王仲孚先生到烟台市参加了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和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大舜文化研讨会”。会后我陪他回到久别的家乡，当地的村干部听说他回去，老早就在村委会办公室等候，热情地接待他。王仲孚先生还打听那些小时候在村子里和他一起上学游玩的同伴，在回县城的路上，他特意参观了矗立在龙口市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并向我讲述了八路军战斗英雄任长伦的英勇事迹。他还将一份由他回忆、搜集整理的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在家乡流行的抗日歌谣赠送给我。在多次交谈中，我深切感受到他是一位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强烈的家国意识的历史学家，而且，学富五车、谈吐不凡、平和达观、幽默风趣、不知老之将至——藉此书在大陆再版之际，我衷心祝福王仲孚先生永葆“仁者寿”的心态，如《礼记·学记》所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四方莘莘学子将奉先生为上座而叩问焉。

谢玉堂

2013年2月20日于泉城

新版自序

这本书初版于1996年在台湾以繁体字印行，由于内容比较“冷僻”，原不期望能有再版的机会，现在能够以简体字的新面目再版呈现，首先要感谢山东大舜文化学会会长谢玉堂先生的大力支持。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中国上古史又称先秦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包含的范围颇广，从传说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皆有论述的题目。因为我在撰述这些论文时，正在担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的课程，基于教学的需要，必须通博，不能像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可以用数十年时间专注研究某一领域或某一个专题。

另外，本书所运用的材料以文献为主。本来就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材料而言，应该多运用考古材料，或以地下史料来印证纸上史料。由于本书各篇写作时，两岸尚未开放交流，大陆的出版品，包括考古报告与有关先秦史方面的著作，在当时台湾地区的各大学校园里，是不许公开运用和流通的。因此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与教学，也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以文献记载的上古时代历史为研究对象，则比较不会受到材料的限制和环境的顾忌。这是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

除此之外，当时台湾的学术风气，仍然受到民初“疑古派”主张的影响，传说时代的古史完全遭到否定，不要说三皇五帝，就是连夏代也不敢列为讨论的课题。

台湾戒严时期，像《古史辨》一类的著作，都不准公开印行和阅读。其实，《古史辨》七大册，固然收入疑古的文章，而不同意疑古的文章也照样收入，正反意见并陈，是一种讨论学术的态度。而且，《古

史辨》所收各文的作者有些还在台湾，例如傅斯年、胡适、董作宾、李玄伯（宗洞）、钱穆、陈盘、卫聚贤等人，其他如柳诒征、缪凤林、吕思勉、张荫麟……基本上也都不是站在疑古派立场的学者，时代的现象如此，当时许多“禁书”未来将成历史笑话。例如：郭沫若的书不准看，但是冠以“郭鼎堂”看就没人管了；陈梦家、丁山因为人在大陆，他们的学术著作也被列为禁书。但是，有书商把陈梦家和丁山两位学者的著作编在一起，署名“陈丁合著”就可以了。类似这种笑话，都是特殊的时代背景留下来的。“陈丁合”的“大名”至今还收录在台师大图书馆的书卡上。

近人有“走出疑古时代”之说，其实我在三十多年前开始撰写这些论文之时，就已经是踏出“疑古时代”的第一步了。“古史辨派”的疑古，基本的观点认为，许多古代文献都是“伪书”，“伪书”里记载的古史，都是“伪史”。这样的主张显然有很大的偏差，当然不能成为“定论”。顾颉刚提出的“古史层累积成说”影响很大，其实颇多商榷之处，他把史事记载的时代作为史事发生的时代；他怀疑大禹是神话人物，不是历史人物，但他并没有说“大禹是一条虫”，也没有否定夏代的存在，这些应该做仔细的检视和正确的批判。本书对于为何使用文献史料及文献史料之不可轻言废弃，在许多篇前面，都做了说明。疑古惑经并无不可，但是对于古史全盘否定，则无法认同。

通过考古学、人类学对古代文献的检视，本书有许多一得之见，请读者指正。例如：“黄帝制器故事”实具有新石器时代的现象；尧舜传说符合氏族社会特征；大禹的“神格”不能否定其为历史人物；夏代考古的地下材料因无文字发现，应该还不能作为夏史的直接史料运用；殷末内部的矛盾是商代覆亡的原因；春秋时代“诸夏意识”的指出；战国时代六国灭亡的顺位，都是前人与时贤所未注意到的问题，现在读来仍然是站得住的学术观点。

前已提及，本书写作期间，大陆的考古材料不能运用，所以各篇论文主要以文献史料为主，自两岸开放交流之后，大陆的考古材料已

不再受到限制，本来应该利用这次难得的再版机会，把重要的考古材料与文献做适当的配合，但由于这些文献史料包含的范围很广，要逐一检查，补入考古资料，事实上已不许可。好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学术交流已逐渐展开，夏代考古与夏文化的探索成为热门的学术议题，夏代考古的材料不再受到限制，夏史的写作也就比较正常。利用这次再版的机会，增加了两篇夏代的论文：《试论传说史料对夏史研究的重要性——兼释夏》《试论夏史研究的考古学基础》和一篇《先秦的王霸论与大一统论》。

回忆本书之完成，衷心感谢先师朱云影先生的启导，指示正确的研究方向，写作期间时时鼓励，循循善诱，始克有成；本书能够再版发行，要再一次向谢玉堂会长致谢。如果没有谢会长的热心推动，像这样一本冷门的学术著作，恐早已消寂在书海之中了。

本书筹备再版，时近两年，承蒙王绍东先生、惠荣荣女士、王钧林教授多所费心，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感激不尽。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郝逸杰、赵广杰、郭铠铭诸学棣，牺牲假日，代为校稿，备极辛劳，在此一并感谢。

本书涉及文献、考古、人类学以及当代著名学者之论著，内容包含许多方面，虽经详细校订，谬误恐所不免。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王仲孚

2014年5月5日

原版管序

近代“疑古派”对中国传统古史系统的严厉批判，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产生了两项重要的影响：一是改变了史学家认识古史资料的态度，并追求更符合求真原则的研究方法；一是使史学家感受到须重新寻找中国历史源头的压力。对寻找中国历史源头的工作，考古学家做出了“开路”的贡献。

西阴村、安阳与城子崖等地的考古发掘，不但展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新纪元，也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天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田野考古获得资料之多，可用“爆炸”一词来形容。这给重新寻找中国历史源头的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对考古学家与史学家的分工合作和互相借重，发生了催化的作用。

三十几年前，在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的领导下，展开了一项重建中国上古史（自史前至秦统一）的工作计划；并由当时在史语所任职的许倬云先生初拟了一百个子题，经李济之先生等人审订后，分别邀请有关学者撰稿。1972年出版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1984年出版了第二、三、四本。这是一项计划性的集体研究成果。

王仲孚先生任教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史二十余年。他秉着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尽一份心力的情怀，并想在古史研究式微的环境下为欲窥中国古史殿堂的青年学子尽一份点灯的责任，特于近年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近代考古成果及前人研究意见，撰成专

论十余篇，有的已经发表，并具新撰，辑为《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王先生独立完成的这本大作，是一家之言，其对古史教学与研究都甚有参考价值。对王先生执着于古史研究的精神，我尤表敬佩，特为之序。

管东贵

1986年8月于台北市南港

原版自序

我国文献载籍记载的古代历史，在传统史学中，两千多年来，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深受国人信仰。但自民国初年古史辨运动兴起，经“疑古派”学者施予严厉的批判后，不仅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一系列的古史系统遭到破坏，国人心目中古代圣王的崇高地位也几乎为之摧毁无遗。影响所及，读史者为之“四顾茫然”，学者对于以文献为主的建设性古史研究多裹足不前，在大学的历史系里，中国上古史或先秦史的教学资源，呈现严重缺乏的现象，有识者早已引以为忧，莘莘学子更是无所适从。

著者自1973年以来，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中国上古史”课程，其后又在历史研究所开“中国上古史专题讨论”等课程，同时并以文献史料配合考古学、民族学的既有成果，对中国上古史许多重大问题加以检讨、撰文阐释。当时所能运用的主要教学资源，除了文献外，也仅有《大陆杂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专刊》等所载有关中国上古史论文可以参考。而其时台湾的学术环境，仍受着疑古余风的影响，对于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可信程度，许多人还坚持着保留或否定的态度；而两岸之间更是处于紧张的状态，许多大陆上的考古新材料，在大学校园里既得不到应有的信息，即使得到一些，为免触犯禁忌，也不敢随意地运用。所以在两岸开放交流以前，在大学任教而从事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倍感困难。这也是著者所撰论文多以文献史料为主的原因。

本书共收集了十八篇有关讨论中国上古史的专题论文，这些专题，

不仅在探求古史的真相，也对近代古史研究的发展经过和变动过程，加以检讨和回顾。为了说明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以及研究这些问题的基本态度，著者在各篇的“前言”中，有时不免出现重复说明的现象。其次，自两岸开放交流以后，大陆地区的考古材料大量涌现，这对于一个从事中国上古史研究与教学的人而言，自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令著者感到高兴的是，近三十年大陆考古发掘的资料，以及史学界对于中国上古史的意见，已一反疑古之风，基本上对文献史料和传统古史是予以肯定的，如何配合考古发掘的材料加以诠释，才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更应该努力从事的工作，这也是著者乐于把这些论文呈现于读者之前的原因。

此外，由于有些专题的相关论著以及考古资料，二三十年来累积极多，如黄帝传说、中国原始农业的诞生、夏代考古与夏文化的探索等论题，都增列相关论著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本书之得以完成，首先要感念先师朱云影教授，由于云影师的殷殷启导和循循善诱，使我在中国上古史的园地里，知道如何耕耘。回忆云影师为了鼓励我能够坚持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特在我甫升讲师之时，即把历史系的大四必修课“中国上古史”让予我担任。二十多年来，在台湾的史学环境中，从事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与教学，虽然是走在一条崎岖艰苦的道路上，但因有云影师的鞭策和精神感召，使我能勇敢地走下去而未退缩。

其次，1988年8月至1989年7月著者休假，申请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一年，得管东贵所长照顾甚多，除了有专用研究室之外，并得使用及影印傅斯年图书馆藏书及期刊，且有机会向考古界前辈高去寻先生、石璋如先生请益，收获甚多。今本书付印之际，又蒙管前所长赐序一篇，在此敬致感谢。

本书从交稿到付印，著者一再迁延，影响作业时间，承蒙陈钟英女士耐心等待，诸多包涵，印制期间复承丁筱媛、石兰梅、杜钦、林天人、秦照芬、梁国真、陈文豪诸学棣费心协助校稿，而两年前文稿

初成之时，曾得台湾师大历史系八三级同学多人热心代为誉稿，大名无法逐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上古史所涉及的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盘根错节，学者复见仁见智、各持观点，本书各篇亦仅能提供几个思考和观察的角度而已，疏漏谬误，在所难免，学者专家，不吝指教是幸。

王仲孚

谨志于台湾师大历史系 1986 年 8 月